

纪
实
与
回
忆

丛书

JISHI YU HUIYI

JiShi Yu HuiYi

忘年交

我与郭沫若、田汉
的交往

陈明远
著



世
林
出
版
社



纪
实
与
回
忆

丛书

忘年交

我与郭沫若、田汉的交往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忘年交：我与郭沫若、田汉的交往 / 陈明远著. —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12

(纪实与回忆丛书)

ISBN 7-80616-797-8

I. 忘… II. 陈… III. ①郭沫若(1892~1978) - 生平事迹②田汉 - 生平事迹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4521 号

忘年交

——我与郭沫若、田汉的交往



作 者——陈明远

责任编辑——许钧伟

封面设计——周剑峰

出 版——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文庙路 120 号)

电话：63779027 传真：63768540

印 刷——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9.25

字 数——21 万

插 页——4

版 次——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3 000 册

书 号——ISBN 7-80616-797-8/I·293

定 价——16.00 元

自序

打倒“四人帮”以后,在整个80年代,活跃在中国新文坛上的主力军,有这样两支人数众多的队伍:

其一,被称为“归来者作家群体”。大致上是文革前、特别是反右前,在艺术上就已经有所建树,后来受迫害而沉默而被驱逐出文坛的“老右”、老“反”,生于1920—1930年左右的理想主义一代,反思的一代;

其二,被称为“知青作家群体”,大致上是文革初期仍为学生的“老三届”、“老五届”,后来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红卫兵、红小兵们,生于1950—1960年左右的觉醒的一代,转向实用主义的一代。

我不属于上述两个大群体,悄然游离于任何派系之外,两间一卒,真可谓“遗世而独立”。

我生于1941年,“反右”运动时我还在上海中学读书,躲过了那场劫难;1963年大学毕业(五年制)后分配在中国科学院做研究工作。受过建国后最扎实、最完整的高等教育。我们这一批青年学士被称为“知识分子的后起之秀”,成为80年代中国科研、教学的栋梁中坚。事业青黄不接的危难关头,担负了承前启后的沉重使命。“十年浩劫”以后,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力、科技文教事业,我们这些40多岁的一批

骨干,大都尽心尽力在不同岗位上奋斗拼搏,作出了极大的牺牲(据统计,80—90年代北京中关村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不到50岁),而很少能腾出精力从事业余文艺创作。

只有诗歌是我坚持不懈的个人爱好。从8岁以来我每年都不间断地写诗,在“十年浩劫”中写得更多。诗歌篇幅不大,便于表达自我的感触,达到灵魂的升华;1986年以来,我先后出版了5部诗集。但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我虽然有时受到邀请,却根本没有余暇时间参与诗坛的许多活动。我被戏称为“运动场之外的选手”,“在野的诗人”。

80年代上半叶,我主要从事“中文电脑”的研制工作,曾担任华侨实业公司和四通公司的技术顾问。我应邀在各地讲学,传授“信息化”的最新成就,印行了两部学术著作:《语言文字的信息处理》和《语言学与现代科学》,多次再版,共发行几十万册。这两本书,都是我国改革开放时期最早的论述“信息化”的开创性著作,成为80年代中文电脑工作者的案头必备工具。

稍后,我主编了我国第一套供外国人学习中文的录音带系列:《中国话听力》,在全世界发行。我还参与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学术工作。

由于历史的机缘,我从小得以认识郭沫若、田汉、宗白华、老舍、夏衍、阳翰笙、王了一、钱三强、周培源、华罗庚等……“世纪老人”。他们出生于上一世纪末年,是我爷爷一辈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我跟他们的交往,引起文化界持久不断的兴趣。在整个80年代直到今天,一些编辑同志常向我约稿,记者常向我采访,要我回忆这些“忘年交”的第一手史料。这些回忆文章都是在仓促中草就的,无暇刻意文笔的修饰,只是想起什么就说什么,但却引起社会的关注。发表后,各报刊纷纷转载。多年以

2 忘年交——我与郭沫若、田汉的交往

自序

来,许多人向我提出,希望将这些文章整理结集出版,而我却一直操劳忙碌,挤不出时间来着手这项工作。

感谢萧关鸿、曹维劲两位先生,给予这些文章结集出版的机会。

本书选入近十几年来我陆续在各刊物上发表的有关郭沫若、田汉的回忆录、史料的一部分。80年代以来直到现在,这些文章的内容经常被人们引述和评论。不仅许多有关著作根据和摘录了这些素材,而且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赏析、20世纪知识分子评议、当代思想文化史等领域中,这些文章也提供了第一手的丰富资料。对于一般读者说来,本书也具有可读性和参考价值。

关于“郭沫若致陈明远的书信”,收入《郭沫若书信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初版),前几年曾受到质疑,许多专家则倾向于基本认定这些书信的真实性;但由于“文革”以来的特殊历史状况,且由于这些书信辗转传抄,鲁鱼亥豕,难免有所脱误。应许多同志的要求,本书收录最早披露“郭沫若致陈明远书信”的周尊攘先生的文章(征得本人同意)。据说郭沫若故居也收藏有一部分(大约40封)书信的原件(其来源尚有两种不同说法)。“学术为天下之公器”,文化界一直呼吁执有者尽快公布于众,以实事求是的原则,加以对照校正。

陈明远

于北京丝竹园

1998年9月8日

目 录

1	自 序
1	追念郭老师
24	诗歌——我生命的翅膀
69	新诗与真美的追求
88	残叶缀成的花圈 ——忆郭沫若老师
93	白杨忆郭沫若
105	附：郭沫若和陈明远的忘年交
108	郭沫若的忏悔情结
112	高处不胜寒 ——丁东、陈明远谈郭沫若
121	田汉老伯和我
139	田汉冤狱
178	田汉和郭沫若友谊纪程
201	田汉和少年中国学会 ——与宗白华先生谈话录

208	左联时期的田汉
231	田汉的人格
242	宗白华谈田汉
252	《郭沫若致陈明远书信》质疑
261	郭沫若和青年陈明远的通信交往

2 忘年交——我与郭沫若、田汉的交往

追念郭老师

前 记

有些老前辈一再表示希望我写几篇回忆郭老师的文章。他们说：“在跟郭老有联系的青年学生中间，你是跟他通信较多、过从甚密的。郭老对你的长期关心、爱护和培养，体现了他对于未来一代人的热爱和期望。你有责任把这些情况记载下来，让人们从一个侧面了解郭老思想和人格。”

回想起来，我总是感到非常惭愧，自己做得太不够了，离郭老师对我们的期望，还差得很远。

从1953年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整整十二年间，郭老师经常写信给我，见面时跟我亲切交谈，并且不厌其烦地花费很多精力和时间替我批阅、修改诗稿和笔记。后来郭老师曾把十几年间经他批改的这些诗稿、笔记交给我集中在一起，竟有几尺高。这里面凝聚着郭老师多少心血啊！深为可惜的是，在十年浩劫期间，这许多文稿大半因动乱和抄家而散失了。残留下来的郭老师写给我的信件只剩一部分，另外还有几个笔记本保存着一些记录。书信、文稿可以丢弃，资料、照片可以焚毁，但郭老师留在我内心深处的印象，是任何力量也无法磨灭的。

在这里我先写一点史料，以后再陆续补充。最近白杨阿姨

到北京来,她跟我共同回忆往事,许多情况就可以记叙得尽量准确些。如果本文中有些记错的地方,以后当核实订正。

1982年2—6月

〔一〕

我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跟郭老师并没有什么亲属关系。从小到大,在我心目中的郭老师总是一位和蔼可亲的“百科全书”式的老师。我不清楚他有多少头衔(确实也从未想过那些),而只是称他为“郭老师”或单单称呼一声“老师”。他不止一次地说过,他总有个愿望:带几名青少年学生一道讨论问题,做个名副其实的“老师”。他不仅要教我们做诗、做学问,更要教我们做人。他觉得这是一种很大的安慰。

我从十一岁以后在上海中学念书,住在学校宿舍里。我的父母当时从上海调到沈阳东北邮电局工作。郭老师了解到我星期天往往一个人蹲在学校图书室里埋头看书,很关怀我的身心健康。他写了一封信给我,让我在星期天按他给我的地址和“介绍信”去找两个人。一位是叶以群,另一位是白杨。我先到复兴西路找叶家,不巧他出门开会去了。然后我就去华山路找白杨,一找就找到了。她见到我非常高兴,马上叫出了我的名字。我一愣:她怎么会预先知道我呢?她的热情接待很快地消除了孩子的腼腆,赢得了信任和好感。(后来她告诉我:当时郭老早就嘱咐过她,有这么一个“明远小朋友”,很刻苦勤奋,星期天也不肯休息。郭老自己不能经常到上海来,因此托她如果方便的话,在假日关心一下明远的文娱生活,做到劳逸结合。所以白杨一直等着我到她家去玩。)认识以后,她也很喜欢我,因此二十多年来我就一直叫她“杨阿姨”。

2 忘年交——我与郭沫若、田汉的交往

杨阿姨对我说,她是在抗战初期的上海认识了刚回国的郭老,当时她才十七八岁。后来辗转到达重庆,在周恩来同志和郭老师领导下从事革命文艺工作。她在跟我长期的交往中,讲过解放前的许多斗争事迹,特别是在国民党统治区演出《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等剧本的盛况。她告诉我,1941年秋重庆文艺界集会庆祝郭老师五十寿辰,(那年杨阿姨才二十一岁,而我还刚刚诞生)。那是一次对反动派的有力的示威,周恩来同志在庆祝会上讲了话,题目是“我要说的话——论鲁迅与郭沫若。”

我听了很感动,就把这件事记录下来。以后,在叶以群同志指导帮助下,又查阅四十年代的报刊,找到了周恩来同志那篇讲话和许多有关资料。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我终于把这一段史料整理成一篇长文,交给郭老师。郭老师看了以后,用红铅笔在上面写了一句话:“不宜发表”。他还叫我“不必耗费时间”去描写他的往事。我知道,郭老师非常谦虚,不愿意宣扬自己。这使我对郭老师敬爱的感情更加深切了。

〔二〕

解放后直到六十年代初,郭老师住在北京西四缸瓦市大院胡同5号。我在学生时代有一年(注:1957年高中二年级)暑假到了北京,郭老师写信说,欢迎我去他家谈谈。

我拿着郭老师写给我的地址,找到了他家。这像是一个清朝府邸改建成的,朱漆大门,高墙深院,门房还有警卫值班。我当时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心里疑惑是否弄错了地方?揉揉眼睛,核对了门牌,鼓起勇气问了问,然后由值班的警卫带了进去。

郭老师正在书房里写文章,见了我非常高兴。他满面笑容地问:“你为什么脸这样红?是太阳晒热的吗?是跑得出了汗吗?”我说:“不是太阳晒得发热,是心里紧张得发热。”郭老师慈爱地拉着我的手端详着我说:“紧张什么呢?你喜欢我这儿吗?”我回答:“有喜欢的地方,也有不喜欢的地方。”他很感兴趣地问:“哦?那就先谈谈你不喜欢的地方,好吗?”我说:“您家又不是公安局,为什么有警卫值班呢?”郭老师听完就笑了。然后他对我解释说:因为他担任好几个部门的工作,每天跑来跑去办公,既费时间又容易误事,所以,领导上决定让他在家里办公。“是这样一回事啦,我们国家机关办公的地方都要布置警卫,所以门房就有人值班啦。”郭老师稍停了一会儿,擦擦眼镜,叹了口气说:“其实我内心里一直也不大愿意住在这样王府式的地方,有点跟人们隔绝的味道。我是喜欢像普通人家一样,经常有邻居来往。我特别喜欢小孩子们常到家里来做客的啦。像从前我们在重庆住过的地方,在上海住过的地方,我回忆起来都觉得满有意思。”他非常留恋地询问过去他在上海虹口狄思威路(解放后叫溧阳路)的旧居,如今怎么样了?四川路底内山书店有什么变化?这些问题我都回答了。郭老师频频点头微笑。

“那么你再说说,你喜欢我这儿的什么地方呢?”郭老师问。我回答:“我喜欢您这儿有这么多好看的书,我喜欢听您讲学问。要是您愿意常常教我的话,我就更喜欢到您这儿来了。”郭老师显得高兴极了,连声说:“好!好!好!我真愿意当一个老师,带一班少年学生!我乐意把这儿办成一个‘少年之家’,欢迎你们来!”

郭老师关心地询问我们学校的集体生活,询问我们同学中间对他的作品有什么意见。我说:“同学们都很爱看您的几部历史剧,也爱看《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历史人物》这几部著作。

4 忘年交——我与郭沫若、田汉的交往

但是,对于您近来发表的一些诗,同学们可有不少议论哪!”郭老师赶紧问:“有什么议论你快讲给我听。”我大胆地说:“同学们都讲您有些大白话的‘诗’算不上是诗,只是分行写的散文。我喜欢您写的《骆驼》那首诗,我都能背诵出来。我在学校的晚会上朗诵过这首诗,同学们热烈鼓掌。不过,‘璀璨的火云’这一句念起来不上口,听不懂。是不是改成‘灿烂的火云’更好些?”

郭老师很诚恳地说:“你们的意见很对,我都接受。我的白话诗有一大半是应时应景的分行散文,我自己都不满意,更难使你们满意了。我很想把那一大半不是诗的东西删掉,免得后人耻笑。你们同学有什么意见,不管多尖锐,请你都如实转告我,好让我以后进行删改!”他还说:“写诗是必须有年轻人那股劲头的。有时我感到自己年岁大了,快要老朽了,不行了,但我总是拼命想保持着年轻人的这股劲头。我怎么也不服老。我还想努力写出一些好作品留给你们,留给后代。希望你们多帮助我。在我作品里看到不妥的地方,尽管指摘出来。我是非常感谢你们的!”

从此以后,每年郭老师都把他的著作一本又一本地寄给我阅读,叫我提意见。这样,我跟郭老师的通信就日益频繁起来。

〔三〕

我在上海中学念书的时候非常爱好数学,同时也喜欢诗歌。我尝试用白话诗的形式翻译改写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和唐诗宋词。数学的严格训练和诗歌的熏陶,两者相互调剂,丰富了我的生活。郭老师知道以后,很是鼓励。他寄来了《屈原赋今译》、《楚辞集注》和闻一多等人的有关著作,供我学习参考。

他又要把所有译稿都寄给他看。这样一连许多年，我在课余时间像做老师布置的作业一样，译写了大量的古典诗歌，约莫每月一次寄给郭老师。郭老师在我幼稚的译稿上作了反复的修改，写了详细的批语（有时一页纸上面郭老师的字比我译稿的字还要多），寄还给我。然后我又利用节假日重写、誊清，再寄呈郭老师审阅。在那最可贵的青春岁月里，在发奋钻研数学的余暇，这些译诗的“课外作业”充实了我的精神，陶冶了我的性情。当我长大以后，郭老师告诉我：他在寂静的夜晚批阅这些“作业”，也感受到无比的欣慰。十多年以后，这些译诗稿汇集成了好几本。

为了掌握古典诗词的格律，我也学着练习五七言和长短句。一开始写得很不像样，名副其实是小学生的“涂鸦”。但是郭老师仍然耐心地仔细地看了，并向我指出其中的毛病。我初学的诗词往往平仄不调，觉得入声字特别难以掌握。郭老师就教我吴方言（上海话）来辨明入声，牢记诗韵。不过，郭老师并不希望我写旧体诗。我问：“那么为什么您自己写那么多旧体诗呢？”他说他是旧式教育的牺牲品，铸成了那样半文不白的格调，没有办法，对自己很不满意。他鼓励我学写新诗，探索诗歌的新形式。所以，我又尝试用现代体的新型节奏和韵律，翻译改写郭老师的旧体诗。每次寄给他的译稿，他都批阅、修改了再寄还给我。他好几次在来信中或交谈中对我的译诗进行勉励和指导。1958年11月，在郭老师六十六岁生日那天，我把郭老师修订过的译诗稿抄录、装订成册寄给他，作为小小的礼品。

1958年底，我收到郭老师一封热情洋溢的来信，是两页很漂亮潇洒的毛笔字，（通常郭老师给我写的较长的信是用钢笔写的。）信中说：这件礼品使他的生日充满了快乐。他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他成为公开的共产党员了。他觉得自己像一个新生的

婴儿,充满了创造的激情。他希望我们继续比赛下去,你追我赶,要永远保持青春的活力。长征不会有歇脚的一天!

〔四〕

1959年2月,郭老师带着历史剧《蔡文姬》的初稿打印本,到上海征求意见。记得当时正是学校寒假期间,我反复读了有关的资料以后,尝试着手翻译改写《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同时,我也大胆地向郭老师说出了自己对于“替曹操翻案”一文看法,认为其中有些地方不妥。我曾向老师提出建议,剧本《蔡文姬》的主题应围绕“胡笳十八拍”的诗歌创造过程,而不要过分突出曹操,特别不要把曹操捧上天去。郭老师笑着说:童言无忌,童言无忌!”后来(1961年秋天)北京人艺剧团到上海演出《蔡文姬》,正好郭老师在上海,他约我一道去看戏,同时把他仔细修改过的《胡笳十八拍》和其他一些译诗稿交给我。他问:“你这几年译写《胡笳十八拍》的时候,怎样体验蔡文姬的心情呢?”我说:“我回想起解放前人民群众的苦日子,回想起战乱中颠沛流离的经历。”老师说:“恐怕你年纪太小,对于苦难的感触还不够强烈。从白话诗的形式、节奏、韵律上来说,你译写得不错。只是对原著的理解上欠深刻。这也不能苛求于你。我替你修改了,主要是对原著的思想解释得更确切一些,尽量传达出那种悲愤的感情。那是封建社会中深重苦难的一个缩影。现在把译稿交还你,但你不要急于发表。在身边放几年以后,再拿出来看看,那时也许还能改得更好些。”老师停顿了一下,感慨地说:“现在你们对于蔡文姬心中的悲愤是体验不深的。我不愿意你们再蒙受什么苦难。我希望你们再也不要那样的经历。我希望你们年青人今后的生活和诗歌充满了阳光和鲜花。”

大约在1960年春天,有一次随郭老师吃饭的时候,白杨阿姨说:“郭老,您再给我们写一个剧本吧!”郭老师笑着说:“正有一个!是我早就想写的一个剧本。我这次要表扬盛唐的了不起的女英雄——武则天!我觉得你(指杨阿姨)最适合演这个英雄人物了。你乐意吗?”杨阿姨说:“当年在重庆公演《屈原》,我担任的角色是南后;现在您倒好了,更升级让我扮演女皇帝了!——我还是希望演一些现代题材的戏,表扬现代的女英雄。”

后来我读了《武则天》剧本,发觉剧中人上官婉儿的某些台词(特别是对诗歌的议论)好像跟我以前讲过的话差不多似的。我曾问过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儿?郭老师笑着说:“难怪你看出来了。我确实曾借上官婉儿的嘴,转达出你小时候对于诗歌的一些纯真的看法。这就是来源于生活嘛!在《郑成功》里面,也借用过你这个模特儿。你是不是要提出抗议啊?”我说:“上官婉儿是个女孩子,怎么能……”郭老师笑着说:“你在中学念书的时候,不是有同学给你起个绰号叫‘小姑娘’吗?”我脸红了。因为我从小性情文静,肤色较白,又有点儿腼腆,有的同学就那样跟我开玩笑。这恐怕是叶以群或者杨阿姨告诉他的吧?我对郭老师说:“我不愿意别人这样说我。我要长成一个堂堂男子汉大丈夫!”老师看着我的眼睛说:“是的,长大了要刚毅,要坚强!最好是外柔内刚。刚强不等于骄傲自大,谦虚也不等于虚伪造作。要做一个刚强正直的人,才能写出真正的好诗——或者把一生变成一首纯真朴实的诗。”

〔五〕

1960年初,我在学习日文的时候,从旧杂志上发现了抗战

前夕郭老师用日文写的《我的母国》，和他早年在日本留学时代所写的二十几首诗。我把这个“新文学考古”的发现告诉了老师，并抄去了原文。他也很兴奋，在给我的信中说：“谢谢您抄来的我未收入集子里的诗文。”（摘自1960年2月信。）“这些诗确实是近半世纪以前我在留学日本时期写的，但如果没有您重新发现，我自己几乎全忘了。”“我好像又看到了自己的青年学生时代。”（以上均为1960年信中语。）

以后，我又陆续发现了郭老师未收入集子的一些诗文，数量相当多，其中不少是很有价值的。于是我利用学校的寒暑假，写成了几篇文章：《郭沫若留学日本时期的诗》、《郭沫若早期的诗剧》、《从“前茅”到“恢复”的战斗诗篇》、《沫若诗话》……。其中有的文章，郭老师审阅修改后转给了叶以群同志，作为史料发表。当时我因为自己是专攻数学的学生，不愿意用真名发表，就由郭老师和田汉老师两人给我起了个笔名“海英”（后来又写成“海鹰”）。

我对于郭老师的生平为人和作品风格了解得愈深，就愈发增强了一个念头：要用散文与诗有机结合的形式，写一部《郭沫若评传》或者叫《郭沫若——他的为人和他的诗》。我收集了有关材料，先搞了一本十几万字的《郭沫若编年录》。对于郭老师生活中的一些重要事件和行踪、日期，在通信中向他进行了多次询问。老师答复了一些问题，澄清了一些事实，但在信中对我说：“您费那么多的课余时间埋头写作，翻译我的旧诗，我总有些感觉着不安。……‘诗文’我赞成写，但是赞成您写自己的生活，不必悬想别人的生活。您写您自己吧。我的旧生活，我觉得是不值得您那么费力去悬想的。我自己对于它都不感兴趣，我想别人是会更不感兴趣的。因此您的悬想，恐怕有点白吃力。”（摘自1961年6月1日信。）“我以前搞过的日记和资料大抵都丢